

葉

日無人叩竹扉

陶

家雞鄰犬偶穿

籬四壁

階在欲忘機

觀釣頗逾

垂釣趣種花何問看花誰細推物理

一凝思

出版文集

幾日雲陰

不開遠

黛鎖江

隈鄉閣漫動庾郎哀風葉飄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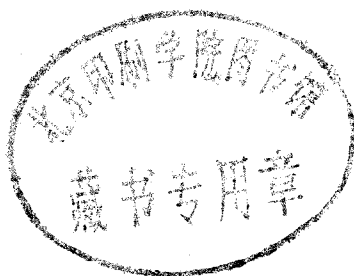


鳳凰出版社

紙徘徊

G230-53
95-4x

叶圣陶出版文集



中国书籍出版社

• 北 京 •

(京)新登字 008 号

出版人 洪忠炉
责任编辑 苏振才
封面设计 张守义
责任校对 陈俊珏

叶圣陶出版文集

YESHENGTAO CHUBAN WENJI

叶圣陶 著

★

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西绒线胡同甲 7 号)

邮政编码:100031

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11.25 印张 263 千字

1996 年 3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

ISBN7-5068-0217-1/G·97

定价:12.00 元



作者简历：

叶圣陶，1894年10月28日生于江苏苏州。五四运动前，参加李大钊、鲁迅支持的《新潮》社；1921年，与沈雁冰、郑振铎等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1923年起，先后在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人民教育出版社从事编辑出版方面的具体工作和组织领导工作。参与创办、主编或编辑的杂志有《直声》、《诗》、《文学周报》、《小说月报》、《中学生》、《抗战文艺》、《人民教育》、《中国语文》等；主持编辑出版了各类教学大纲、教科书、教学参考书约500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出版总署副署长，教育部副部长，全国人大第一至四届代表和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第一、五届常务委员会委员和第六届主席，全国民主促进会主席，中央文史馆馆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等职。著有《稻草人》、《倪焕之》等书。

编者前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出版事业得到了很大发展；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改革开放，发展非常迅速。不仅发展的规模和速度是历史上空前的，而且出版的总体质量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现在可以说，在我国已经初步形成具有全国规模的，包括图书、报纸、期刊和音像等门类齐全的，编辑、印制、发行、物资供应、专业教育和科研各个环节相互配套的出版事业。和世界各国相比，我国也已跻身于出版大国之列。

事实说明，出版事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其重要性越来越清楚。1983年6月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把出版工作推到我党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出版工作日益成为广泛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的有力工具，成为促进经济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的重要手段，成为向人民提供丰富多彩的精神食粮的重要桥梁。出版事业既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条件。出版事业的发展，要由经济、文化、政治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来决定，同时又为经济、文化、政治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服务。出版事业的状况如何，不仅是出版部门的局部问题，而且直接关系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

摆在我们广大出版工作者面前的重要任务是，以建设有中国

DN-26.02

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社会主义的出版方向,加快出版改革开放的步伐,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逐步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版体制,进一步发展繁荣我国的出版事业,更加有力地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任务服务,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认真研究新中国 40 多年来丰富的出版实践经验,从理论上加以总结和提高,进一步揭示社会主义出版工作的规律,这是加快出版改革、发展出版事业的重要条件。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国家出版行政管理机关先后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有着丰富的工作实践,他们的讲话、报告和文章,曾经具体地影响和指导了一个时期的出版工作。虽然其中某些内容难免历史的局限性,但是,在总体上,不失为一笔反映我国出版历史进程的宝贵财富和研究当代出版事业的宝贵资料。有计划地、系统地加以整理出版,对推进出版科研工作、从理论上总结出版实践经验,对加快出版改革开放、发展和繁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都是有意义的。

基于以上认识,经袁亮同志建议,新闻出版署同意,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和新闻出版报决定联合编辑出版《中国出版论丛》。计划选编建国以来国家出版行政管理机关部分负责同志有关出版工作的讲话、报告和文章,一人一卷,计划 10 卷左右,两年时间完成。这套丛书由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这是我们首次编辑出版这类著作,一定会有不妥之处,希望出版界同仁和广大读者指正。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
新 闻 出 版 报

叶圣陶和编辑工作

叶至善

我的父亲叶圣陶生于 1894 年,1988 年逝世。他在晚年说:如果有人问他的职业,他就回答说,他的职业是编辑。在长长的一生中,他做编辑工作的时间最长,超过了 60 年。

他进商务印书馆正式当编辑,是 1923 年年初;在这之前一年,他和朋友们一同编的《诗》已经问世,《诗》是我国第一种新诗刊物。

他在商务编辑所工作了 8 年,主要在国文部,编辑小学国语课本,中学国文课本,还有学生国学丛书。曾代替郑振铎先生编过一年半《小说月报》,后来又被调去编《妇女杂志》,编了不到半年。在业余,他担负了文学研究会部分书刊的编辑工作;五卅运动中,和朋友们一起编《公理日报》;大革命之前,受中国济难会委托编《光明》半月刊;还有其他,都是义务的,并非现在所谓的“第二职业”。

1931 年年初,他进开明书店编辑部工作,主要编《中学生》杂志,也参与其他书刊的编辑。他和朋友们编了好几部国文课本,还独自编写了一部小学国语课本。他是《新少年》半月刊的创办人;《月报》创刊,他担任文艺栏的主编。还在业余,编了一部《十三经索引》。

抗日战争爆发,开明和在上海的许多出版业一个样,受到很大

损失，暂时处于停顿状态。他离开了开明，携家进入四川。《中学生》在桂林复刊，他挂上了主编的名义，可是人在乐山，无法参加实际工作。那时他感到很寂寞，由于离开了日夕相处的老朋友，也由此放下了编辑工作。

1940年秋天，他接受四川省教育科学馆的聘请，名义好像是什么督导员，主要的工作却是编写语文教学的辅助读物。在业余，他给成都当地的书店编课本编刊物，取得一些报酬来贴补日益贫困的生活。他还担任《笔阵》的主编，这是中国文艺界抗战后援会成都分会的机关刊物。

1942年，开明书店在成都设立编辑部办事处。他回到开明，主持办事处的工作。在编辑方面，除了主编《中学生》，别的图书也全归他管，助手只有我母亲一个。到1945年《开明少年》创刊，才添了一个我。这并非父亲的主意，是朋友们实在过意不去，而我又早在帮父亲的忙了。父亲似乎还有用不完的精力，几家小书店请他帮助编辑图书期刊，只要是他认为值得出版的，他都乐于接受。

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开明大体上恢复了原来的规模，人员却比战前精简多了。编辑部包括专业校对在内，不足二十人，几乎一个人就相当于现在的出版社的一个编辑室。我父亲担任编辑部主任，好在都是熟朋友，出什么书，刊物怎么编，大家随时商量。他负责终审《中学生》、《开明少年》、《国文月刊》的稿件，书稿也大多归他最后审读。为了试验中学语文教学的改革，他还和朋友们一同编了好几套国文课本。

1949年初，父亲离开上海，绕道香港进入解放区，也就从此脱离了开明。直到“文革”开始，这16年间，他的精力主要用在中小学教科书的编辑出版上，只要看他担任的职务就可以知道。先是担任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出版总

署副署长，分管编审局，编审什么呢？主要是中小学教科书。过了不久，出版总署的任务明确了，主要抓管理，就把业务部门逐个划分出来，于是成立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由我父亲兼任社长和总编辑。出版总署撤销后，他担任教育部副部长，仍旧主管人教社，职务没有变动。

父亲屡次说：他当不了领导，最适合的是让他当个责任编辑。在人教社，他主要做的实际上正是责任编辑应该做的工作：根据各科的教学大纲制定选题，编写或组织稿件，审读，修改，定稿，设计版式，直到校对付印，检查成品，他都事必躬亲。有人以为他只管语文，其实不然，数理化他也管，也参与定选题，改稿件，看校样，尤其是生物课本，花的力气不小。别的机关和出版社、杂志社请他看各种稿件，他都认真审阅；朋友们托他看著作稿或翻译稿，他也从不拒绝。此外，他还对标点符号的用法作了规定，在印刷字体的统一和排版格式的改进方面，也作了不少工作。

在十年浩劫中，父亲跟出版界绝大多数人一个样，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文革”以后，父亲没有再担负出版方面的职务，可是老关系还在，请他审阅或修改稿件的出版社、杂志社，还有老朋友，又渐渐多起来，他都应承下来。有的征求意见稿用小五号字印得密密麻麻，把他的眼睛也看坏了。有一次在给我弟弟的信上说起又在看什么什么稿子，跟下来一句是“总之都是中国的事”，意思没有说清楚。我体会他说，凡是中国的事，不论谁要他干，只要他还能干，他就得尽力干。最后审读的可能是《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的注释，那是1984年10月，他正好90岁。在他长长的一生中，他经手的图书期刊到底有多少种，实在很难估计。

父亲的编辑思想，跟他的文艺思想和教育思想是一致的。他早年曾猛烈抨击《礼拜六》派把文艺作为纯消遣品的游戏态度，同时

指出生活是文艺作品的源泉，文艺作品应该反映时代，应该担负起唤起读者、改革社会的责任。还指出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在于感染，不应该采取教训甚至恫吓的手段。他认为改革社会要从基础教育做起，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使他们得到全面的发展，成为自觉进取的，能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合格公民。他也说过，出版工作也是教育工作，对编辑青年读物和少年儿童读物来说尤其如此。

开明书店成立于1926年，1930年，创刊《中学生》，等于公开声明从此把青年作为主要的读者对象，包括在校的和失学的青年。创刊人夏丏尊在《中学生》上接连发表文章，阐明受教材不等于受教育，青年不能关在学校里光读教科书，应该认清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学会如何做人如何处事。这许多话正是我父亲要说的，无怪乎他宁可减少薪俸，接受了开明的招邀。他在开明编辑部感到很开心，朋友们不但看法相同，作风也相同。他们大多教师出身，不满意当时的学校教育。他们知道哪些知识是青年所必需的，哪些问题是青年所关注的；又熟悉青年的阅读兴趣和理解水平。他们编写读物从来不用教训的口吻，而是跟朋友谈心一样，和读者平等地商讨问题。他们都善于跟作者交朋友，尊重作者的意见，保护作者的权益，因此他们也都写文章在别家报刊发表，对作者有充分的理解。他们还熟知印制技术，尽可能给印制工人，尤其是排版工人以方便，遇到困难能一同商量解决。他们注重出版物的质量，既对读者负责，又对作者负责，总起来说就是对社会负责。当时在文化界、出版界，把他们的作风称作“开明风”。

在北上进入解放区的途中，父亲作过一首七律，中间有一联是：“箕士为山宁肯后？涓泉归海复何求？”我想，“箕士为山”指的建设一个崭新的中国，“涓泉归海”指的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编审

中小学教材是党交给他的主要任务，他当然得努力做去，在各科的课本上体现党的教育方针。在开明编辑所，他习惯于无为而治，又事必躬亲，人教社跟开明大不相同，人员是从五湖四海调集拢来的，人数越调越多，编辑室越分越多，使他难以适应。他自己也说，他成了个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者。遇到的困难是很多的，工作十分劳累，在日记上，他都有具体的记载。

我不是没考虑到，由我来叙写父亲在编辑出版方面的工作是不相宜的。可是和他一同在商务、在开明工作的老朋友，大多去世比他早，连抗日战争后期的，如今也寥若晨星了。我从小生活在父亲身边，许多事还能约略记得；近几年来编二十五卷的《叶圣陶集》，又把脑海中的记忆梳理了一遍。要写这样一篇比较全面的简介，还是由我来吧。我一边写一边警告自己：下笔要客观，除了记叙事实，别的话一句也不要说。警告尽管警告，实际上没有严格做到。我当编辑不是父亲教的，他不主张我搞文字工作，我却主要是跟他学的；我爱上了编辑这一行，而且莫名其妙地感到自豪，主要是受了他的熏陶。在字里行间带上点儿感情色彩，在我恐怕是免不了的，只好请读者明察了。

1994年6月20日

目 录

编者前言

叶圣陶和编辑工作

叶至善

在新华书店总管理处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1)
希望大家用心提高出版物的质量·····	(3)
在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上的开幕辞·····	(6)
在三联、中华、商务、开明、联营五单位联合干部 会议上的讲话 ·····	(10)
为提高出版物的质量而奋斗 ——在第一届全国出版行政会议上的报告 ·····	(15)
出版史料和出版事业 ·····	(29)
我们的宗旨与态度 ·····	(31)
跟上教育体制改革的步伐 ·····	(35)
跟《人民文学》编辑谈短篇小说 ·····	(37)
反对八股腔 形成新文风 ·····	(41)
漫谈标点分段的古籍 ·····	(45)
谈谈翻译 ·····	(49)
多登载知识小品 ·····	(51)
革命的出版活动 ·····	(54)

谈谈开明书店	(56)
商务印书馆	(58)
我和商务印书馆	(61)
记我编《小说月报》	(64)
《读书》创刊五周年随笔	(66)
《辞书研究》创刊五周年随笔	(69)
 日记选编	 (71)
(1949 年 10 月至 1954 年 11 月)	

在新华书店总管理处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今天新华书店总管理处成立，我说几句话。

从前，我也在一家书店的总管理处做过事情。那书店当然不是什么人民的出版事业，只是普通的出版行业。虽说是普通的，我对它也存着笼统的希望，总要把出版工作搞得好一点儿。出版工作是人做的，无论编辑、排印、发行等等都要人来做，所以要把出版工作搞得好一点儿，就得大家用劲，大家把工作当作自己的事情干。

那时候，那家书店里发生过“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争论。我是属于“自下而上”一派的，以为一切都得由大家商量，编辑、排印、发行各方面的工作，都由大家来讨论，讨论过后得到结果，配合起来，就成为总的方针。这样，总的方针中间每人有他的一份在内，干起来当然要带劲得多。有人说这么办不对，他们认为书店的最高领导权属于“董事会”，方针应该由董事会决定，然后交到各部门去执行。好像董事会既懂得编辑，又懂得排印，也懂得发行，样样都懂得。这是“自上而下”的一派。我想，董事会是从股东里面推出来的，对书店来说，这些人无非是代表老板，代表资本。他们在书店里投了资，就连全部出版工作都懂得了，比实际搞出版工作的人更懂得了吗？我不大相信。实际搞出版工作的人能出主意，可不要他们出主意，只要他们执行。董事会不一定能出主意，偏要出主意，出的主意就要大家照办。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出版工作怎么搞得好？

现在我明白了，在私营书店里，要想“自下而上”是不大容易

的。因此，私营书店——私营企业——的工作人员就没法摆脱雇佣观点，也就是不会有主人翁感。样样都得“自上而下”，工作人员只要对付过去，不至于打破饭碗，就成了，这是道道地地的雇佣观点。

新华书店就不同了，新华书店是国营企业。这个国家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是人民的，咱们都有份。所以做国营事业的工作，就是做咱们自己的工作，凡是认真的人，就必然产生主人翁感。咱们现在是不会有雇佣观点的。新华书店现在和出版总署分开了，但是实际工作仍是连结一致的，密切相关的。今后大家在担任的工作岗位上，一定能够加强自己的主人翁感，把新华书店总管理处的工作做得更好。

我主要说的是私营企业和国营企业的不同之处，在国营的新华书店工作，自然会产生主人翁感。咱们现在讲“民主集中”，不单是“自下而上”，请大家出主意，还要把大家的主意集中起来，“自上而下”请大家一同来实行。这样上下循环交流，一切方针办法都是整体的表现，当然有强大的力量。这是我从前所理想的，今天亲眼看到了，并且生活在其中，心里非常的高兴。我的话说得很简单，十分抱歉。

（1950年4月1日）

希望大家用心提高出版物的质量

首先祝这次会议成功，做到真正的统一分工。

我讲两点意思：第一点，希望大家用心，提高出版物的质量；第二点，报告一下暑假以后教科书的供应情况。

最近，出版总署将要通过新华书店总管理处向各地新华书店发一个通知，大意是我们新华书店出版的书籍在质量上还不能完全没有错误，希望大家认真检讨，逐步改进。编审局首先表白了自己的错误。最近出版的三种有关苏联的书籍，都有些问题。一种是《中苏关系史料》（新华时事丛刊），大家该记得，这本书在发出去后即通知停售，待修正后再发售。一种是《苏联》，另一种是《中苏史话》（均系通俗小文库），都是在发出去后通知停售的。

《中苏关系史料》内有一篇孙中山与越飞的宣言。这篇宣言当然是有的，但是翻译的文字并不可靠，很有些可以怀疑之处。我们把来历不明的材料编进这本史料，就是不够认真。后来把这一篇删去了。《苏联》和《中苏史话》，内容也都有若干问题。编审局看稿不认真，一方面是造成了政治上的错误，一方面浪费了印刷和纸张，是应该检讨的。

各地新华分店印的书也有这种情形。有的分店掌握印刷机和纸张，就要重印一些书籍，在选择上随便一些，就把不应当重印的也印出来了。在将要发出的通知上叙述了这些情况，这里不细说。

认真检查书籍的内容，提高出版物的质量，要集合大伙儿的力

量来干。编审方面的同志固然要特别留意，就是发行、会计等方面的工作同志，如果发现我们出的书内容有不当之处，就是一句话一个字，也应该提出来。你不发觉我发觉，我见不到他见到，各方面的同志都能够这么做，我们出的书，质量就可以逐步提高了。

说到教科书的供应，在近两三年之内，恐怕还不能从容印造，早期运达各地。从前像商务、中华发行教科书，准备秋销的货，早在五六月间已经印好运出了。我们的教科书因为经常要改动，现在还不能做到这样。关于教科书的修改情形，我可以报告一下：

两个月以前，李长彬同志问过我教科书编辑和修改的情形，希望能提早造货，我无法答复。关于教科书的编改工作，文委规定，小学各科由教育部初等教育司负责，中学文、史、地三科由编审局负责。我们把小学教科书都送往教育部，最近陆续有送回来的。初小的八册国语，教育部认为不好，需要修改的地方很多。我们认为就原来的架子是修改不好的，就向教育部提出，请他们另起炉灶，重编一部；目前只能把非改不可的地方修改一下。因而，有许多页须在原来的纸型上挖改。这工作在北京还能做，其他地区恐怕挖改不来，我们非常担心，初小国语、算术，高小国语、历史、地理，现在都在重排或挖改中。高小自然，教育部和我们都认为不好。讲科学最需要精密，这部高小自然却讲得特别不精密。从新来过，教育部又没有人编，我们编审局也不行。因而，我们就委托开明书店的两位编辑担任改编。信在前星期写去了，希望他们5月底完成。今天到5月底只有20几天了，这四五本书能不能改编好，实在不敢保证。

中学教科书方面，高初中的新华国文是普遍采用的。对于新华国文，教师大致有两种相反的态度：一种是迷信新华的，以为新华出版的东西决无问题；一种是看不起这部书的，可是公开不讲，背